

# 小品文的是非

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于1932年9月在上海创刊,提倡幽默。他和鲁迅恢复交往了,就约鲁迅为《论语》写稿。鲁迅写了几篇在1933年出版的《论语》半月刊第11、12、13期连续刊出。《学生和玉佛》,是反对政府当局将受到战争威胁地区的珍贵文物运往安全地区的措施;《谁的矛盾》谈萧伯纳在上海引起的种种反响;《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一文(署名何干)。从题目到内容,看去都是一篇游戏文章,可是就在游戏笔墨之中,透露出一个政治信息,像宋庆龄的邮件也要受到检查: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报》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2页)

就这样,揭露出了政府当局邮电检查的无孔不入。1933年9月,《论语》创刊一周年,他应林语堂的特别约稿写了《“论语”一年》这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它对这刊物既有称赞也有批评:

说是《论语》办到了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鲁迅全集》第5卷,第582页)

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于1934年4月5日创刊。编辑陶亢德寄了两本创刊号给鲁迅。并且向他约稿。4月7日,鲁迅给他复信说:

大札与《人间世》两本,顷同时拜领,讽诵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然此时此境,此作者们,而得此作品等,固亦意中事也。语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囑

勿藏拙,甚感甚感。惟搏战十年,筋力伤惫,因此颇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倘非素有关系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师辈打太极拳,或天矫如撮空,或团转如摸地,静观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幸谅其懒散为企。((《鲁迅全集》第13卷,第67页)

表示拒绝他们的约稿。他看了一下这刊物以后,就在4月12日致台静农的信里坦率地说出了对它的看法:“上海幽默已稍褪色,语堂转而编小品文,名曰《人间世》,顷见第一期,有半农国博《柬天行》云:‘比得朝鲜美人图一幅,纸墨甚新而布局甚别致,想是俗工按旧时粉本绘成者。’纸墨一新,便是俗工,则生今日而欲雅,难矣,此乾隆纸之所以贵欤?”((《鲁迅全集》第13卷,第74页)

《人间世》创刊号上发表的重头作品,是《知堂五秩自寿诗》,诗按手迹影印,还配发了作者周作人的大幅照片,诗共两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同一期《人间世》上,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诗。这一场盛大的诗作唱和,引起了左翼作家和左倾青年很大的反感,廖沫沙、胡风都发表了批评的文章。面对这些攻击,最初发表这《五十自寿诗》的林语堂,写了一篇《周作人诗读法》,登在4月26日《申报·自由谈》上。他认为,周作人这诗,是“寄沉痛于幽闲”,“长沮桀溺乃世间热血人,明人早有此语”,他并引明人张萱《复刘冲倩书》中的一段话:“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癡獃,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輩可无罪。”谈到这些,林语堂愤慨地说:“后之论史者,每谓清淡亡国,不啻为逆阉洗煞,陋矣,且亦冤矣!”

鲁迅看了这篇,立刻就写了《小品文的生机》(收入《花边文学》)一文,对于林语堂文对周作人诗的评论并没有表示异议,只是指出这种洁身自好的态度,“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林语堂这篇文章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化名投稿,系统地攻击《人间世》。”鲁迅说,情况不是这样,因为这些攻击文章有“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既有“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谏论”。这个意思他在5月4日致林语堂的信里也说了:

我实非热心人,但关于小品文之议论,或亦随时涉猎。窃谓反对之輩,其别有三。一者别有用意,如登龙君(引者注:指《文

坛登龙术》作者章克标),在此可弗道;二者颇具热心,如《自由谈》上屡用怪名之某君,实即《泥沙杂拾》之作者,虽时有冷语,而殊无恶意;三则先生之所谓“杭育杭育派”,亦非必意在稿费,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微词谑论,已不能解,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历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但《动向》中有数篇稿,却似为登龙者所利用,近盖已悟,不复有矣。

先生自评《人间世》,谓谈花柳春光之文太多,此即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无话可说之故,亦即空虚也,为一部分人所不满者,或因此欤?((《鲁迅全集》第13卷,第90—91页)

当时鲁迅致郑振铎的几封信里都说到了小品文受到攻击的事。5月24日的信说:

上海盛行小品文,有人疑我在号召攻击,其实不然。但看近来名家的作品,却真也愈看愈觉可厌。((《鲁迅全集》第13卷,第122页)

6月2日的信说:

小品文本本身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但章(引者注:章克标)之攻林,则别有故,章编《人言》,而林辞编辑,自办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坛之堕落,实为前此所未见,好像也不能再堕落了。((《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4页)

6月21日的信:

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鲁迅全集》第13卷,第158页)

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的信也说到这事:

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渊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贍,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暱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

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们试看撰稿人名单,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这许多作者存在,现在都网罗在《人间世》中,藉此看看他们的文章,思想,也未尝无用。只三期便已证明,所谓名家,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中之作者。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悛,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鲁迅全集》第13卷,第92—93页)

1934年8月13日鲁迅致曹聚仁的信说得更加恳切: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引者注:陶亢德、徐訏),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8页)

这时鲁迅在政治上已经转变到左翼的立场,和林语堂已经有很大的分歧,看他的文章多有不同意处,多有批评和争辩。

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1934年12月15日)发表的《游杭再记》里说,他在杭州赏菊,“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表明他对左倾青年的极端反感。鲁迅就在12月26日写了《论俗人应避雅人》一文反驳他: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鲁迅全集》第6卷,第212—213页)

1935年鲁迅作的《理水》这篇小说(收入《故事新编》)里再一次写到这件事,讽刺林语堂说: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没有法子……”((《鲁迅全集》第2卷,第390—391页)

节选自《鲁迅的人际关系》



《鲁迅的人际关系》  
作者:朱正  
中华书局  
2015年6月出版

### 编辑推荐词:

要想了解一个人,可以看看他身边所交往的朋友。要想了解鲁迅,可以看看鲁迅的交游,看看与他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看看与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

本书作者朱正是鲁迅研究专家,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传》等重要著作。《鲁迅的人际关系》,根据鲁迅日记和书信等历史文献资料为我们详细解读了鲁迅的“朋友圈”,这些人,有同道,有论敌:鲁迅与文化界教育界认识交往的情况,涉及与胡适、陈独秀、林语堂、傅斯年等二十余人;鲁迅与政界军界认识交往的情况,涉及与宋庆龄、陈仪、李秉中、陈赓等十余人。